

书人茶话

# 形塑中国，熔铸华夏

——读《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杨博

2024年夏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新版《许倬云学术著作集》（六卷本）。正如许先生在《总序》中指出的那样，从《西周史》《形塑中国》到《汉代农业》，虽然成书次序有先后，但这部著作却是联结在一起的。其中，《西周史》《形塑中国》叙述古代中国自西周建立封建制度以来，经过春秋、战国列国并存的阶段，终于经过秦、汉而实现大一统。这一宏阔的历史进程，先聚后散，然后又再行拼合，最终凝聚成为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在此阶段的中国，政制统一，《汉代农业》又接续陈述了整个过程中经济因素的成分及其融合。最终，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精耕细作式农业”，先民们将农业工业与农业的收获相结合，凝聚为以农业产品为商品的交换经济。这是经济、社会两方面的整合，与国家治理互相配合，进而熔铸为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六卷本中的另外三本，《水书三千》《熔铸华夏》以及《我者与他者》，其主旨也正是澄清上述巨大“共同体”的形塑过程，以及各个构成单元之间的互相依存。前三部侧重于时间轴上的进程，而后三部则着力在平面发展上的“互联性”。整套著作都是从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经济结构多个角度，见证周、秦、汉“天下秩序”的形塑过程，读懂“何以华夏”、“何以中国”。

“形塑中国”的理念，许倬云先生念兹在兹。受许先生和三联书店委托，笔者有幸重译了《形塑中国：春秋、战国间的文化聚合》，在工作过程中，深感“形塑中国”似乎是理解许先生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

## 华夏民族的文化聚合

许倬云选取“西周”作为描绘“何以中国”这一宏阔画卷的开端，深具远见卓识。书中也不乏对“华夏”理念形成过程的深入探讨。在《形塑中国》一书中，先生以社会流动为核心，考察春秋、战国间

的总体社会转型和文化聚合。

究其来源，“华夏”这个称呼是源自周人自称。随着周人翦商以及其后对东方地域的经略，姬姓周人随即将“夏”这一名号颁授给其分封的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也乐于接受，“诸夏”“诸华”遂成为他们的代称和美称。周人大分封，打破了神州大地过去血缘氏族林立的局面，以“华夏”为主导，在中原及其临近地区形成各族群混融融合的新局面。西周、春秋时期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将中原地区的“诸夏”“诸华”与蛮、夷、狄、狄等族融合在华夏族群之中。诸夏或视为蛮夷的秦、楚二国，也都完成了各自的华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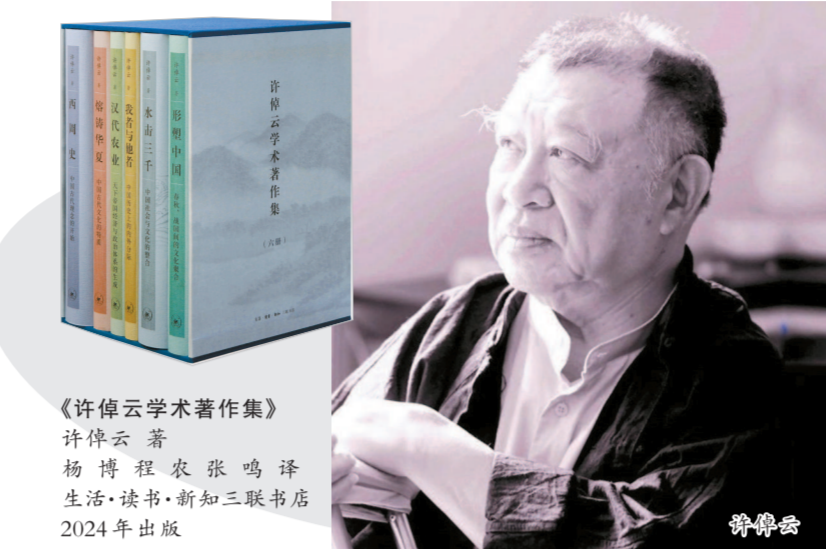
春秋时是将天下的邦国分为“华夏”与狄蛮夷两个类别，两个类别的区分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孔子的话可以看出“华夏之辨”的根本区别还在于文化认同。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由于周王室的“有夏”与其分封的诸侯国即“诸夏”，通过缔结宗法与姻亲关系，成为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当这些“诸夏”共同体，以分封制为基础与土著族群逐渐融合后，这个全新的族群共同体，得名为“夏”，得名为“华”，以至“华夏”，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 华夏先民的区域交融

许倬云提到，西周史，也是“华夏”文化认同的形成史。此言一语中的。可以补充的是，在西周之前，或者说有文字资料发现的商周之前，近年的考古发现，也在不断实证着长江、黄河、淮河各流域，东北、西北、华北、中原、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华夏先民们深入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这种互动甚至伴随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

关注史前考古的师友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赵宾福等先生提出的“查海时代”。



《许倬云学术著作集》  
许倬云 著  
杨博 程 农 张 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出版

这不仅是依时代为序将目前发现的公元前7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划分为查海—仰韶—龙山三个较大的发展时段，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历史材料，更重要的是，如李新伟先生所注意到的红山与凌家滩玉器的相似性，由此可以联想和在一定程度上明确的，是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互动。

无论如何，查海时代的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互

动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话题。最近至庙底沟时代，已出现“最早的中国文化圈”，她东达海岱，西至甘青，南达江湖，北逾燕山，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庙底沟时代的早期中国长期延续至商周时期，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战国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而这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漫长时间交往的结果。

透过先生的思绪，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还使我们看到以华夏族群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也由此知道，“华夏”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封闭的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充满自信的、有博大襟怀的、不断发展的观念。“华夏”高度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周边邦国部族的逐渐融入，不断给“华夏”注入新的活力。

三味书屋

# 阅读，看得见

杨河源

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了火、语言、轮子等决定人类演化命运的重要发明，当中出现最晚当然也最难的是文字。火、语言、轮子的出现，远早于文字，以千年、万年，甚至十万年计。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荣誉高级研究员加亚·文斯在《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中，作了类似呼应：20万年前才姗姗站立的人类，从朝不保夕的采摘渔猎觅食生涯，一跃上天入地近乎支配地球命运，最为关键的驱动力就是副题中的四要素。四要素当中，文字被归为语言的下位，有点委屈。文字受印刷术激发，以排山倒海之力席卷全球，屈指可数，不过短短五六百年。设有印刷术，马丁·路德的《五十九条论纲》就只能影响当时的寥寥数人，不可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共鸣，难免其前一个世纪扬、胡斯殉火的命运。没有印刷术，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大概率仅是衣食不虞的贵族教宗们的雅癖，进不了寻常百姓家。至于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思想启蒙、工业革命等影响持续至今的重大运动，无疑会无限推后。

毕竟，要释放人类获取信息绝对对大宗的感官——眼睛的能力，必须让尽可能多的人看懂文字。而不必像中世纪的欧洲，须经神父居间，向日不识丁的“羊群”转译那在读经台上的《穷人圣经》中的图解。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艺术史博士大卫·特里格在《艺术中的阅读者》这部“歌颂书这一具有革命性的日常之物”的“赞歌”中，在两千年的时间跨度上，以其当代眼光，抓取广义艺术品所呈现的阅读者、阅读场景，让所有热爱阅读的人，在“阅读阅读”的双重注视下，大起吾道不孤的会心。在我看来，《艺术中的阅读者》是一册真正可以“风吹哪页读哪页”的严肃闲书。

说它严肃，在主题。自有文字开始，阅读就从未真正成为全民的必选项。印刷术发明前不必说，“在印刷机普及和大规模生产之前，书籍被视为珍

品，其本身就是精美的艺术品”。以“便士报”1830年代出现算起，具足全民阅读物质条件，至今不足200年，读图时代已呼啸而至。何况相当数量的当代人，忙于“996”奔走衣食，又有多少逸致余暇用于阅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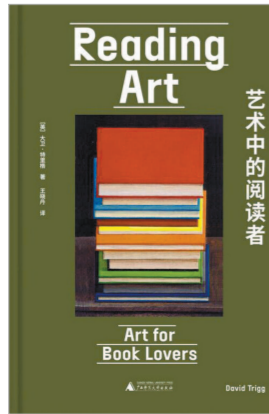
说它严肃，还有政治关涉，简直可谓“政治正确”。尤其在涉及性别、年龄、肤色、族群、文化等或隐或显的敏感议题时，作者几乎使出浑身解数，力争面面俱到和尽可能平衡。单看性别一项——抛开几十幅静物画、装置等阅读者“隐身”作品，其他200余作品中，半数出现女性/童，其中大多数，女性更是单一主角。《艺术中的阅读者》中所涉艺术家，固然不乏丢勒、米开朗基罗、伦勃朗、康斯坦丁·波提切利、乔尔乔内、毕加索、达利、凡·高、库尔贝、马奈、塞尚、列宾、雷诺阿、夏尔丹、威廉·布莱克、布列松、德加、夏加尔、米勒等艺术史上的赫赫名家，但作者绝不忽略人群中的另一半，虽然她们在艺术史上的留名相对晚近很多，数量也大为不匹，如劳拉·詹姆斯、艾伦·塔克、安妮·贝尔、菲奥娜·班纳、玛雅·林·阿丽莎·尼森鲍姆等。就是类似篇章标题页的重点引言，作者也未忽略女性作家的名号，如艾米丽·狄金森——“时光里最宝贵的东西，心灵中最坚强的朋友——书籍。”凯瑟琳·诺里斯——“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想有一本好书正等着你，便觉得这一天快乐了一些。”

说它严肃，是作者揭出的说明文字。如委拉斯开兹的《小丑与书》，作者介绍供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宫廷、外号“表弟”的唐·迭戈·德阿塞多时说：“当‘表弟’不必取悦国王时，他则以宫廷

联络员的身份履行行政职责，甚至要担负起保管皇家玉玺的大任。在此之前，西班牙的宫廷艺术家在描绘残障人士时，总带着一层冷漠色彩。然而委拉斯开兹画过数幅国王猎宫里的侏儒肖像，并赋予他们尊严和人性，正如他所画的王室家庭一般。在这幅画中，‘表弟’的凝视令观众肃然起敬。”

更加严肃的，是作者也许为济读者寻找阅读线索不得之疲累，而以引名家充作篇章间隔的阅读名言。那些语句，或顶礼赞颂，如艾略特：“书籍是人类最安静、最忠诚的朋友；它们是最平易近人、最有智慧的顾问，最有耐心的老师。”或严肃告诫，如阿奎那：“当心只看一本书的人。”或深长忧思，如卫斯理：“当心，别被书籍淹没！一盎司的爱值一英镑的知识。”或痛心疾首，如布罗茨基：“比焚书更严重的罪行之一便是‘不读书’，无不动人。当然，以博尔赫斯‘我所能想象的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名言做结，很恰当。

以作者的全球眼光与通史意识，特里格当然不会落下中国的“阅读者”形象，书中能找到刘勰、文武、张晓明、刘野等中国当代艺术家多幅作品。作为文献大国、雕版、活字印刷业母国，除个别短暂时段如暴秦焚书而外，两周以降特别崇尚阅读的世俗之地，阅读者形象在吾国画像石/砖上、在雕刻陶塑中，尤其在绘画作品中，为数甚多。传统画作一个近乎山中高隐的标配——读书母题：花下、临流、山中、茅斋，画家笔下多有表现，如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就有《春山读书图》《秋山读书图》等。但《艺术中的阅读者》作者对此视而不见，不无遗憾。



《艺术中的阅读者》  
[英] 大卫·特里格 著  
王晓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出版



《阅读的年轻女子》  
让-奥诺弗·弗拉戈纳尔 绘  
美国国家美术馆馆藏

## 转型时代民众的社会身份

在《形塑中国》一书中，许倬云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选取了春秋、战国间的大约700人，追踪他们的社会地位变迁。许先生在书中注意到，春秋战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导致大量的自由平民开始出现。这关系着国家治理方式与民众基本生活方式的底色。

首先，由于春秋末期贵族之间的冲突，世袭贵族阶层事实上基本被摧毁。究竟是谁在国内斗争中幸存下来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的幸存者成为国君；这样所有前贵族领地的租佃都会发现自己成为国君的租佃。其次，为了鼓励军功，列国也常像魏国那样，向有突出战功的士兵赏赐肥沃土地和免税待遇。最后，为了增强国力，各国都非常重视开垦荒地。政府甚至通过设立专门负责开垦荒地的机构来鼓励垦荒。因此，一定数量的平民也会成为独立的自由农民。

在这种情势下，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列国制度革新之后，“编户齐民”成为当时的政府最终的选择。通过户籍方式将全部社会成员的情况进行编录登记，并据此核定人口、土地和赋役的制度，即被称作“编户齐民”。社会成员身份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革，反映出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到战国后期时，社会居民的身份大体上已经由原先的宗族之人变为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正因如此，“编户齐民”成型的战国时期，也被王夫之称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的总结中提到的“邦无定交，土无定主”，就与春秋战国之间人身份关系的变化有关。

通过“分家立户”“编列名籍”，王朝得以直接掌控人口，显著提升了国家获取赋役的能力，奠定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中央政府建立起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基层

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因此，“编户齐民”有效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纵向控制，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能够以更少的官员和成本统辖更大范围的人口和疆域。“编户齐民”的实现过程，既是古代中国过渡到传统社会的转型史，也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史。伴随着秦统一六国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的构建，“编户齐民”的自由民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如许倬云所言：“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显示，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者就是‘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恰恰也是《汉代农业》“中国‘以农立国’”的道路，就是在汉朝被确定下来了”一说的最佳注脚。

三联新版《许倬云学术著作集》，是许先生70余年学术生涯有关古代中国熔铸成型的最为精华的部分。尤其是《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分别从政治文化、社会流动、精耕农业三个方面，梳理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复杂历程，堪称“古代中国三部曲”。三者皆有英文版，历经中、西方学术界数十年检验，至今依然焕发历史久弥新的生命力。许倬云以“大历史”观，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历史发展规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挖掘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对现代化困境的良方。透过许先生的总结，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繁衍演化、文明滋长繁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进程，还可以看到以华夏族群为核心的古代中国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先生一生学术所思，凝结成六卷本“著作集”，先生自言并非只做学术研究，而是希望为已为人陈述一个“中国方式的安身立命”，更盼望中国传统的“个体”与“群体”的紧密关系，亦即“天人”的合一与“群己”的合一，能够与世界应当走的途径，彼此一致，互相启发。我想，这其中的深刻与关怀，读者诸君可自行研读，慢慢体悟！

好书过眼

# 走一趟不一样的旅行 跟着约瑟夫二世皇帝的脚步

叶锦鸿

18世纪末，欧洲君主制开始动摇。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热切地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他想要亲身旅行，感受社会上的真实情况。他没有排场和一大群随从，相反他姓理名，在20多年时间里，亲自游历了他的庞大帝国。他亲眼目睹了他的臣民如何生活、遭受强迫劳动和挨饿。他会见普通民众以及王子和国王，参观医院和工厂，总是寻找新的见解来建立他的现代国家。在拜访他妹妹在法国凡尔赛宫的家时，他感受到法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直到他1790年逝世前，约瑟夫二世在位的四分之一时间都在路上度过，依靠马车穿越欧洲约五万公里，仅此一点就是一项成就。在这个壮举后，再没有哪个统治者像他一样用这种“另类”的方式出行。奥地利作家莫妮卡·切尔宁在这本《微服出行：约瑟夫二世的欧洲启蒙运动之旅》中，深度探索了这位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他同时代的非凡的统治者——约瑟夫二世皇帝的传奇故事。

莫妮卡·切尔宁出生在克拉根福，并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教育、政治学、哲学和新闻学。她所研究的科目已经表现出她对历史和文化交流的浓厚兴趣。她的大部分创作聚焦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其中关于约瑟夫二世旅行的书籍《微服出行》在2023年获弗里德里希·席德文学奖。

《微服出行》主要围绕这位启蒙运动先驱者在1764年至1787年间，以法尔肯斯泰因伯爵之名，避免任何宫廷礼仪而四处旅行的逸事展开叙述。约瑟夫二世希望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苦难，被称为人民的皇帝，受到人民拥护。莫妮卡·切尔宁指出，可能没有一个君主（不排除伟大的腓特烈），像约瑟夫二世一样不知疲倦、焦躁不安、准确了解帝国的所有实况。约瑟夫二世拜访过多位君主，其中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等元首，以及许多皇室官员、贵族和达官贵人。莫妮卡·切尔宁根据历史档案中的对话和描述，尤其是皇帝一再寻求接触普通民众的描绘片段，以生动的文字将约瑟夫二世微服私行的历史场景呈现在读者眼前。

为了顺应时代精神，约瑟夫表现得像一位现代、开明的君主，住在简陋的旅馆里，只带着一小群随从旅行，与路易十六和凡尔赛宫的奢侈和颓废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这位哈布斯堡君主善于奉承法国人，对巴黎的知识生活大加赞赏。他也通过参观工厂、医院和文化机构而不是参加宫廷庆典，树立了自己创新统治者的形象。

在前往摩拉维亚斯拉维科维途中，马车抛锚了。在被迫休息期间，约瑟夫有了他最幸福的想法：从农民手中接过了，像中国皇帝一样用它犁地。藉由有了这样，他不仅表明自己是重农主义者的支持者，将农业视为国家经济的基础，而且还表达了他对被迫从事强迫劳动



《微服出行：约瑟夫二世的欧洲启蒙运动之旅》  
[奥] 莫妮卡·切尔宁 著  
荣玉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出版

的农民的同情。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他曾在瑞士停留。人们普遍认为他会在那里遇见伏尔泰，这次邂逅将代表约瑟夫将自己塑造为“理性皇帝”的巅峰。伏尔泰当时流亡在日内瓦附近，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对教会和社会提出尖锐批评。但也许约瑟夫二世害怕国内顽固保守派的反抗，最终他放弃了这场可能的“世

纪会面”。

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通过这几趟旅行，约瑟夫二世进行了改革，统一了司法系统，废除了农奴制，实行了宗教宽容，逐步削弱来自罗马梵蒂冈教廷的枷锁，又引入了义务教育，进行医疗改革，建立了公医院。君主保留了其超然的地位，但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国家最重要的公仆”。约瑟夫的政策让许多哲学家和其他18世纪晚期自由改革的倡导者欣喜若狂。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对他的权威产生任何重大挑战，所以又被称为“约瑟夫主义”。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出，一直以来她着迷的一个问题是，约瑟夫二世在撕裂的18世纪进行的旅程究竟具有何种现实意义。于是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包括许多当时约瑟夫二世自己写下的旅行笔记，以及他和周围人的大量信件等原始资料 and 二手文献的基础上，在维也纳宫廷和国家档案馆、法院和国家图书馆，度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仔细研读了11箱手稿和二手文献后，作者完全沉浸在18世纪的世界之中，将自己代入了这位微服出行的皇帝，因此在讲述中自然地流露出小说的特点。她得出结论：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区域差距与发展不均，弱者正变得更加脆弱。当下正在分崩离析的社会就像在18世纪就曾反复出现的民众动乱、抗议和反抗之景况，可能陷入一场无法预知的结果。直到今天，约瑟夫二世仍会唤起人们对那些认真对待人民需求的政治家的希望，他走遍各个角落，倾听并给与支持，而不是将自己封闭在权力中心。因此，这位微服出行的皇帝成为动荡世界中一个神秘的存在，而对其旅行的描述则成了一种对政治的可能性的研究。

最后，书中也探讨了约瑟夫二世的另一项才华：音乐艺术。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的品味影响了1780年代维也纳的音乐生活：他偏爱德国歌剧和喜歌剧、和声音乐（管乐）和简单易懂的教堂音乐；他不喜欢复杂的宫廷音乐、歌剧和芭蕾舞。约瑟夫是莫扎特的支持者，他在1781年委托莫扎特创作了《后宫诱逃》，在1786年委托创作了《剧院总监》，并聘请洛伦佐·达·蓬特担任宫廷诗人，这又促成了《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女人心》等歌剧的创作与表演，奥地利的维也纳在他统治下成为欧洲“音乐之都”。

虽然约瑟夫的继任者远不如他激进，在某些情况下像弗朗西斯二世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但约瑟夫王的统治仍然改变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进程。他创建的官僚机构将持续到19世纪及以后。围绕着他的宫廷和追随者的自由主义文化将继续存在，印刷业将继续发展，尽管君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面前有所倒退。事实证明，约瑟夫实施的改革对奥地利开放公共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并在19世纪之交达到顶峰，其中咖啡馆的兴起和后来的维也纳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史学记忆密不可分。